

新聞事業與戰爭責任： 論日本「思想的科學研究會」之新聞思想

林鴻亦*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卓南生 2020 年的專著《東亞新聞事業論》為起點，論述聚焦在「新聞學的戰爭責任」上；這焦點既是卓南生新聞史研究、時事評析，以及新聞教育的關鍵前提，更是了解當代日本不可或缺的實質範疇。戰前，日本新聞學著重傳播效能，許多菁英投身軍國主義宣傳，但在戰後，這批專業人士卻「轉向」成為協助美國建設民主日本、大眾傳播的執行要員；一時之間，言語雖能表達，但在傳播過程中無法有效傳達意義的「傳播隔閡」卻在大眾中普及開來。圍繞著 1946 年出版的雜誌《思想的科學》而於 1949 年成立的研究會，正是掌握這段歷史的關鍵角色，也能成為理解卓南生書寫脈絡的背景。結論揭示二戰後的新聞學如何成為日本的思想史課題，以有效參與當代文化建構的歷史變局。

關鍵字：《東亞新聞事業論》、《思想的科學》、新聞學、傳播隔閡、戰爭責任

* E-mail: 075051@mail.fju.edu.tw

投稿日期：2021 年 12 月 16 日；接受日期：2022 年 06 月 15 日

壹、研究動機

近來在華人新聞史研究社群中，卓南生在 2020 年的新著《東亞新聞事業論》引發關注。一則是因為該書是資深學者退休前經驗傳承的力作，二則是在書籍中不斷提及的兩個觀點：「新聞事業必須負起的戰爭責任」，以及「帝國主義操控報業言論的雙重標準」；在國際秩序面臨重組的此時此刻，這樣的堅持值得我們省思。

卓南生為新加坡籍華裔，早在二十世紀 60 年代留學日本，80 年代獲博士學位，先後於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以及京都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部任教；期間分別在 1990 年於日本、1998 年於台灣、2002 年及 2015 年於大陸出版專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奠定其研究中國報業發展史的重要地位，加上他 70 年代起長期擔任《星洲日報》、《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東京特派員、社論委員等，對日本政界的觀察與評論精準、辛辣，可說是徹頭徹尾的新聞人。2010 年，他提前從龍谷大學退休轉往北京大學、廈門大學等任教，帶領中國年輕學者扎根歷史科學的新聞史研究，其學術歷程足以列入中國新聞史的篇章。

《東亞新聞事業論》一書近 500 頁，共分四部分。有關新聞史研究者集中在第一部分「近現代華文新聞史的探源與發現」與第三部分「東南亞華文報業縱橫談」；其要旨為：動態地觀察帝國主義介入東亞、東南亞華文報業誕生、發展的歷史，¹進而思考近代報業萌芽之際中國面對的國際處境，以及報紙言論具有的跨國性²特徵。藉由這些研究成果，卓順勢提出核心論述：戰前帝國主義侵略之時，報業追求國家利益，但戰敗後未痛徹反省，使得新聞論述的「雙重標準」極其明顯，因而產生一種歷史連續性。依此觀點，作者發展出第二部分「日本的新聞學與大眾傳媒」，除系統性地觀察日本的新聞傳播學發展，還同時以時評、輿論觀測的方式，向日本的大眾傳媒、右翼政客提出質疑：不論是二戰前還是戰後，日本新聞界對內都採取國家利益至上的標準，而在媒體再現（representation）亞洲時則多使用隱含侵略性、歧視性的言論。第四部分「與青年學者分享研究的苦與樂」，卓則從研究者

1 該書主要研析之報刊有《中外新報》、《中外雜誌》、《香港船頭貨價紙》、《遐邇貫珍》、《六合叢談》、《察世俗每日統計傳》、《東西洋考每日統計傳》、《叻報》等。

2 一般在理解新媒體改變傳播環境時，常以國內媒介間的競爭與受眾對訊息的接受度來理解媒介生態，卓南生研究的可貴之處在於發現，新媒體的開創期，無論在經營權或話語權上都必然具備的跨國性特徵。

的自我定位開始，為年輕學者釐清面對史料、言說環境時可能遭遇的盲點，並質樸地傳遞「論從史出」、「理論關照現實」的治學態度。

在東亞新聞事業 (Journalism) 發展的議題上，卓南生總結出兩個特徵提供省思：第一，再次確認中、日兩國近代報刊的誕生並非單純出自國內因素，而是有來自帝國主義擴張的國際因素。第二，這些在殖民地開拓港或租借地由洋人開辦的報紙，其言論當然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上。具體來說，這些華文報紙背後由政治、宗教、商業等鐵三角加以支撐，其論調緊扣英、美國家利益，對鴉片銷售中國的議題抱持道德上的雙重標準。在社會科學領域裡，雙重標準多運用在性別研究中，但在新聞史的脈絡中，西方傳教士對鴉片問題的看法，竟會因其在母國或在中國而有差異 (卓南生，2020，頁 56-59)；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也貼近於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在〈宗教的拒世及其方向〉 (Religious Rejec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Directions) 一文所論及的宗教共同體 (community) 在「對內道德與對外道德的二元論」 (Weber et al., 1946, p. 329)。換言之，是在區分內外的道德觀上出現的「對內寬容、對外嚴厲」；或是「對內的道德標準並不適用於共同體外部」的雙重標準 (轉引自野村一夫，1996，頁 1-3)。因此，這段東亞新聞事業史可說是言論的鬥爭史，而其歷史特徵則是映照出核心關注：「帝國主義者的雙重標準與新聞事業的戰爭責任」 (卓南生，2020，頁 6-7)。

他的研究策略因而是持續揭露帝國主義者的雙重標準；譬如在第二部分第八章〈「明治維新」與近代化論爭〉，對普遍被稱為開明、進步的中國文學研究者、思想家竹內好 (1910-1977) 提出批判；他以親身經驗的「實體的亞洲觀」抨擊竹內提出的「理念型亞洲觀」，並引京都大學教授井上清³ (1913-2001) 的批判：「即便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這也是個可恥的戰爭」 (卓南生，2020，頁 10)。而竹內主張的「大東亞戰爭不僅有侵略戰爭的面向，同時也具有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間戰爭的面向」 (同上引，頁 276) 的「大東亞戰爭的二重性」論調，不僅顯示竹內並未反省戰爭，其言論就是站在帝國主義者立場的雙重標準上。卓又以戰後日本重新評價明治維新的例子說，這其實與大東亞戰爭當下新聞論調中師出有名的「義戰論」相似，是以近代化的高低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值得尊重的雙重標準。卓南生

3 馬克思史學家，1967 年因支持中國共產黨發起的文化大革命而批評日本共產黨，遭開除黨籍。專攻日本史，尤其對天皇制有不少研究成果的井上主張廢除天皇制，且在釣魚台的歷史及歸屬問題的相關研究中主張琉球未曾擁有釣魚台，日本聲稱擁有釣魚台主權違反國際法等，自始至終鮮明維持作為反帝國主義學者的立場。

認為即便敗戰後，日本仍舊藉由大眾媒介反覆合理化這個雙重標準，進而模糊了戰爭責任，也因此新聞事業應負起這個延續至今的戰爭責任。

但因卓南生問題意識清楚、立場分明，加上對「論從史出」的堅持，讓他忽視了經驗主義思維並不全然仰賴白紙黑字的史料，同時也會因個人戰爭體驗的不同而有所出入。正如同卓的問題意識或多或少來自其東南亞華人的認同，而這摻雜了日帝統治下的記憶與傷痕一樣，忽視這些經驗與感知並不足以克服雙重標準。誠如井上清所說：「區別太平洋戰爭的二重性是重要的」（卓南生，2020，頁 285-286）；但對一般日本民眾而言，在否定大東亞戰爭的侵略性之際，是否應一併否定因侵略事實而造成與亞洲在心情上一廂情願的連帶感呢？活在當下的民眾是否真的能揭穿（debunk）大眾媒體大力放送的我敵邏輯呢？「戰爭的二重性」的確因戰後初期日本民眾的戰爭體驗仍舊強烈而在論壇多所討論，這也如同卓與井上所言，有被右翼份子利用成為「東南亞侵略戰爭微妙論」的依據。卓也因此主張：「要真正反思戰爭，只有從全盤否定大東亞戰爭作為起點」（同上引，頁 11），但在否定侵略戰爭的起點，日本社會卻也引發論戰，且當中的思想複雜度似乎不足以用「日本並未反省戰爭」帶過，本文認為釐清這個複雜性或許能為今後戰爭與新聞事業（學）間串起理論的迴路與現實的關懷。

在日本，這些論戰不僅是新聞史的爭議，同時也是「思想史」的課題；換言之，反思新聞事業戰爭責任的思想史爭辯，在日本究竟如何成立？本文因而從新聞學的思想性談起，藉著梳理戰後「思想的科學研究會」（以下簡稱為研究會）的活動，特別是卓南生求學時相識的哲學家、傳播學者鶴見俊輔（1922-2015）在新聞、傳播學的理论化工作與社會實踐，以及同為研究會重要成員的竹内好的文學精神、言說策略在該問題上扮演的角色；探討戰爭責任如何成為戰後日本最重要的思想、新聞事業（學）課題。尤其該會系統性地研究建制派學者、新聞記者等如何迎合時局，而政治正確地出現思想的「轉向」⁴正是侵略戰爭無法徹底反省的關鍵，以及如何視新聞事業（學）作為反抗轉向的方法。整理這些後較能掌握卓南生於 60 年代末期甫到日本之際新聞論壇的樣態，更能一併回應前述井上清、卓南生對竹内好有關雙重標準的批判。也因此，本文採取「思想史」而非歷史學的取徑，藉以掌握思想運動過程中的浮動性。

4 中文或可譯為變節。轉向一詞被廣泛使用在二戰期間日本政府大量拘捕共產黨員入獄，逼迫共產黨轉向軍國主義一事；在當權者眼中帶有嘲諷日共屈服國家的意涵。

貳、新聞學、新聞事業與大眾傳播之間

《東亞新聞事業論》的原型，也就是日文版《東アジアジャーナリズム論：官版漢字新聞から戦時中傀儡政権の新聞統制、現代まで》；卓南生將英文 Journalism 的日文音讀「ジャーナリズム」譯為「新聞事業」，藉以體現其中帶有負責任的專業義理或規範性意涵（卓南生，2010）。但不可否認的，這詞語同時也有企業、機構的商業色彩。在日本，Journalism 依其語境同時可譯為新聞產業、新聞學、ジャーナリズム等，卓並未清楚交代這些字詞之間有何差異，只是以「新聞事業」的詞彙籠統涵蓋。但如果要以「新聞事業」來取代ジャーナリズム的話，就不能不討論前述戰爭責任論中，新聞學、新聞事業與思想之間的辯證關係。因為不同於英文世界，Journalism 多半強調的是作為大眾媒體的工具性活動和專業發展。但在東方社會，近代報業體現著西化思潮，也就是說，言論自由不時面臨來自政治、資本、宗教的壓力，因此，Journalism 一詞亦指涉報人辦報的意志與思想；也因而才需衍生出其從業之專業義理或規範性意涵。⁵ 簡單說來，從日本近代報業發展之初，Journalism 同時具有實用、規範與思想性的邏輯，但在現今產業化、學科化過程中，思想性邏輯已日漸消逝。

在日本，相較於漢字「新聞學」的學術色彩，以片假名表記のジャーナリズム最早出現於明治初期，初始是不知如何翻譯而直接音讀的舶來品。字義雖有記者親眼目睹的「現場主義」，但並不受限在記者身份上，也可對應在活躍於文壇、論壇，仰賴投稿維生的民間知識份子。在此，ジャーナリズム泛指包括立基在文學、哲學、思想在內的評論與日常生活點滴的紀錄（journal）；而記錄作為再現的形式也必然帶有民俗文化的意涵。因此ジャーナリズム一詞學科性格較弱，以瓦版新聞之民俗文化史研究聞名的小野秀雄（1885-1977），在 1929 年於東京大學文學部創辦新聞學研究室時，就高度重視新聞學的職能，而有意無意地抹去報業誕生初期的民俗學色彩。他雖承認ジャーナリズム具思想性意涵，卻仍將 Journalism 譯為「新聞學」以爭取學術建制的話語權。在《新聞原論》（1949）中，小野就主張新聞學應循

5 從卓南生關注意識形態、言論的流變與傾向皆可看出他並非無視 Journalism 的思想性邏輯，其「新聞事業論」是兼容了實用、規範與思想性邏輯。但如果要在中文語境中來加以定義的話，日後這幾個邏輯之間的辯證、相生關係就須加以釐清。而以下 Journalism 如在日本論壇語境，而涵蓋實用、規範、思想性邏輯的話，就以ジャーナリズム表記之。在此，本文暫不將卓南生提示的「新聞事業」等同於ジャーナリズム，畢竟近年大陸學界對於「新聞思想」的討論有日趨熱絡之勢，詞彙間的磨合仍有待時間考驗。

著偏重時間的經驗主義（史學）態度，重視組織產製新聞內容的實務技能，而提出記者「應具備特定之能力」。另一方面，他也強調這些重製事實（再現）的文本作為社會的言論，勢必有其意識形態的強度及演變歷程，而將「言論生產的時間軸」視為：「內在於報紙的精神力，而與國家發展高度相關」（小野秀雄，1949，頁4）。

與之相對，卓南生立教大學的老師小山榮三（1899-1983），則是以空間向度為新聞學定位；他曾在東京大學新聞學研究室擔任研究員，不僅於二戰期間參與了大東亞戰爭的宣傳工作，戰後也是協助聯軍監控國內輿論的要員。而在《新聞社會學》中，小山則以媒介空間性想像來理解社會的「媒介生態學」一詞（小山榮三，1951），處理了傳播過程中都市化、人口學相關變項，奠定了日本現代大眾傳播學的基礎。

總之，在新聞學的學術建制過程中，ジャーナリズム內涵民間言論、思潮與民俗文化的思想面向是被刻意忽視的。畢竟，「思想」一詞帶著改變社會的能量，自明治維新以來便為社會高度重視；日文的這一詞彙來自漢文古籍，一般在用法上與中文無異，是西化過程中新造之概念，從而反向輸入中國。在二戰前後，對思想的學術性解釋收斂在：「根據理性、思考、情感、意志等心理作用所形成或其形成物」（黑住真，2014，頁21），而有別於思想在中文語境中仰賴西方哲學強調之概念性意義。日本論壇對思想的想法較為寬鬆，具美國實證主義哲學背景的鶴見俊輔就認為：思想是一種仰賴「日常生活話語」的思考，具體說來就是一種「自我內部的對話」（久野収、鶴見俊輔編，1969，頁330、669）；而這也呼應了Journalism字義中帶有日常生活紀錄的意涵。對此東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所教授內川芳美（1926-2004）、創價大學教授新井直之（1929-1999）於1983年編著的《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ズム：大衆の心をつかんだか》中，就深刻描繪了ジャーナリズム隱含日本人在近代化過程，人們對於感受信念、態度的堅持，透過日常紀錄時事與思想的軌跡，ジャーナリズム必然與政治、經濟力之間蘊含著緊張關係，其社會性又與當下的文化極為密切（內川芳美、新井直之編，1983）。該書其實反映了論壇長期探討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思想究竟是存於個人還是組織，又其思想是否有其社會性等問題（根津朝彥，2019），加上戰後反思新聞學、報業是否應負起戰爭責任，而歷經了概念上的磨合，都讓具民間色彩的ジャーナリズム蘊含獨特的思想史意涵。

對ジャーナリズム之於政經權力的理解，內川芳美多少繼承了小野秀

雄、小山榮三對新聞學的解釋⁶（內川芳美、新井直之編，1983，頁 ii），但書中對大眾社會等「較具人味」的描寫卻是隱含內川這輩年輕學者反思過去新聞學服務國家權力的歷史。戰後在盟軍最高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 GHQ）的主導下，不僅是新聞學界，大眾傳播機構的要員們也都重新披上民主的外衣繼續盤據權力核心，導致日本整體言論環境急速惡化。不僅是小野與小山，另一位宣傳學大師、慶應大學教授米山桂三也是在二戰期間以新聞學、宣傳學報效國家的智囊。但戰後卻在 GHQ 民間情報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Section，簡稱 CIE）的指導下，宣傳學一轉成為民主主義的「大眾傳播學」重新出發；米山也與小山共同參與美國政府主導的輿情觀測，接著各大學等先後成立新聞、傳播相關學科的背後都有美國霸權運作的痕跡（吉見俊哉，1999；佐藤卓己，2008）。

而在業界則有戰前曾任朝日新聞記者，同時也是政府經濟智囊的笠信太郎（1900-1967）；戰爭之中，他身為推動國家總動員法的核心人物，戰後卻繼續擔任朝日新聞論說委員、董事等，而他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 CIA）合作的經歷至今仍有多處等待釐清。戰前擔任讀賣新聞社長、情報機構高官，敗戰初期身為甲級戰犯的正力松太郎（1885-1969），戰後卻與 CIA 合作，搖身成為日本電視台的創辦人（有馬哲夫，2008）。這都顯示戰前效忠軍國主義的新聞學者、新聞媒體機構，戰後毫不掩飾其政治正確而「轉向」服務美國主導的大眾傳播、民主主義。加上戰後日本強化國內公安、與美國簽訂「相互防衛援助協定」、成立自衛隊、打擊日本共產黨等，都被民間知識份子稱作「逆進程」（reverse course）而高度警覺。尤其保守派在轉向後，繼承了戰前軍國主義迫害共產黨的思維，他們主導的「赤色清洗」（red purge）更是徹底將日共污名化。而這也讓多數日共認定日本至今未曾改變帝國主義態度，淡化了對亞洲共產國家的戰爭責任。總之，當時的知識份子不僅憂心大眾傳播的反共宣傳會打擊革新派，更認為這些二戰期間鼓吹國民參戰的要員們輕易地承認發動戰爭的錯誤，只是表面上反省了侵略戰爭，目的是為了重回政治舞台。也因此，知識份子普遍期盼相對於大眾傳播のジャーナリズム能為社會顯露「民間言論的人性面」，藉民間思想以警覺國家、資本帶來的暴力，而ジャーナリズム也在實踐過程中逐漸獲得了學術話語權。

6 尤其內川芳美認為，ジャーナリズム發生在近代社會的形成過程中，作為政治社會的神經系統、輿論的控制裝置，其概念應獨立於大眾傳播。

所以，卓南生於日文版使用的ジャーナリズム可說是依從戰後的學術常規，但建立常規的並非盤據權力核心的學術大老，因為他們對戰爭的反省帶有追隨美國、戀棧權力的政治正確，反而是由戰後民間學術社團「思想的科學研究會」核心成員，以及少數任教於新聞學系所教師們的共同努力下，讓ジャーナリズム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獲得學術話語權。正如卓於書中高度評價的内川芳美、稻葉三千男、香内三郎、荒瀬豐、鶴見俊輔、日高六郎、城戸又一等人，他們不僅在戰後新聞、傳播學的發展上貢獻所長，也與研究會有著或多或少的互動，甚至鶴見長年擔任《思想的科學》主編，荒瀬也曾加入編務工作。

這些新生代學者與小野秀雄、小山榮三最大的不同是世代差距，也因此參戰內容和程度，以及對戰爭的認知都有所差異。觀察其學術訓練，他們多半能理解當時美式行動主義對受眾的關注，另一方面也重視戰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戶坂潤（1900-1945）對傳播環境的解讀。其中戶坂在〈新聞現象的分析〉將ジャーナリズム解釋為：在社會意識形態的其中一個樣態與契機。其基本特徵是：它會包含特定的思想性格或傾向，而思想本就需要主體的意圖才得以純粹化。所以戶坂的定義並非主張新聞應中立、客觀，而是強調主體對日常生活的再現與反思，以及言論的獨立性上（戶坂潤，1932；轉引自根津朝彦，2019，頁129）。加上戶坂在〈ジャーナリズム與哲學的交渉〉主張：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特徵絕不只在報導，也在於知識份子的主體性思想與批判性論述。他修正現象學哲學大師西田幾多郎（1870-1945）所指的「純粹經驗」來思考ジャーナリズム的功能；將西田「純粹經驗」中主體與客體兩端連為一直線的「主客不分」邏輯，進一步修正為只有主客兩項並無法充分認識現代社會，應有第三項ジャーナリズム來媒介主、客體才是。所以ジャーナリズム並非只有傳達資訊的報導行為而已，而應同時具備「再現」報導、評論時事的特性⁷（戶坂潤，1936）。在戰後大眾傳播產業蓬勃發展之際，重讀戶坂的確讓過去重視國家層級的ジャーナリズム理解，轉為由下而上的民間社會活動。

7 〈ジャーナリズム與哲學的交渉〉一文收錄在《思想としての文学》中，本文認為，其通篇脈絡說明了文學、藝術活動中，ジャーナリズム有其媒介主、客觀的機能，而作為一種再現的形式，文中也對ジャーナリズム作為社會意識的代表型態有深入地說明。

參、作為民眾思想課題のジャーナリズム與轉向

這群新生代學者不論是戰前受德國宣傳學、馬克思主義影響，還是戰後接受美式行動主義思潮，他們都是在反省了戰爭的非人性面後，期盼新聞學、報業內在的「精神力」並非僅服務國家，而應內在於民眾、知識份子的言論、思想中；而他們仰賴的正是如前述，藉ジャーナリズム的反思能量讓戰前「人」極端受限的主體性獲得解放。而在回復主體性時，前述產官學要人們的思想「轉向」就是無法逃避的課題。依照鶴見在《轉向：共同研究》的定義：

轉向的特徵在於依從權力的強制而產生的思想變化……。不僅是戰前的共產、社會主義者在國家權力下轉向國粹主義，在自由主義者跟國家主義者身上也都能看到轉向的例子（思想の科学研究會編，1959，頁 1）。

正如聯軍接管日本時，CIE 觀察敗戰後日本人普遍有著「思想上的真空」，建議應趁機填補才得以讓日本人理解民主主義；而這正可說是美國試圖讓多數日本人思想轉向的具體例子。在作法上，CIE 認為首先應為日本守住國體的核心「天皇制」，以免受共產勢力赤化；接著是讓學者導入美國思想、學術研究與行政制度，並透過大眾傳播建立「形式上的民主主義」（松田武，2008，頁 193-195）；而這首先須藉由大批佔據權力核心的要員們轉向，才得以確保美、日兩國政府對日本全境的控制能力。雖然戰後反動派雜誌也關注轉向議題，但論述卻集中在戰前共產黨人士被捕入獄一事來提升日共領袖的道德高度，而這也因此強化轉向有罪的刻板印象，而失去了深思戰爭責任的機會（橫尾夏織，2009）。

對此，不做道德判斷，且系統性地研究知識份子、新聞記者、媒體企業轉向的民間學術社團就屬 1949 年結成的「思想的科學研究會」。該會自詡具民間ジャーナリズム精神，在成立前先是於 1946 年以出版雜誌《思想的科學》的形式出發，召集多位新生代學者們共同參與編務與撰文。文章不僅批判性探討歐美人文社會科學在日本活用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他們極為重視橫跨二戰前後的言論發展，而這就無法避開包括「轉向」在內的思想動態。雖說如此，成員們普遍認為轉向是個尷尬的議題，並未在戰後第一時間處理

是因為需要時間醞釀。直到 1959 年 1 月鶴見俊輔⁸才在研究會中成立了小型研究團體「轉向研究會」，研究對象包括 50 位知識份子、新聞記者，成果於 1959 年集結成《共同研究：轉向 上中下卷》一書。鶴見更在 1965 年《ジャーナリズムの思想》定位了「轉向」在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的重要性。雖然研究追究了政治人物重返權力寶座的責任，同時也成為未來反戰活動中市民組織運作之際的參考，但卻在較為年長的知識份子中評價兩極，批判集中在：研究未能做出價值判斷而欠缺立場與階級觀點，且成員因世代差距等而有戰爭體驗不盡相同等情況（橫尾夏織，2009）。

作為進步派知識份子的重要論壇，《思想的科學》不僅引入西方思潮，也在核心成員鶴見俊輔主導下從語言學、傳播學的角度，以小說、電影、落語、翻唱、浪花節、⁹ 搞笑等日本大眾文化為素材，廣泛研究、記錄日本民間的思想與文化領域；他們主張這種草根性的知識、文化運動才是克服轉向的作法。譬如該雜誌訪談在文化面有功績的民間人物，這種在台灣被視為民俗史、口述歷史的工作，他們卻認為如能從中抽取反思日常生活的素材，那他們就籠統地視相關言論具ジャーナリズム色彩，而ジャーナリズム的反思、對言論壟斷的抵抗將能有效打擊菁英們的轉向。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們並非從史料的角度來判斷日常紀錄的價值，主張其價值應在於能否作為不斷推敲琢磨民間思想的素材才是。加上在第三任主編兼會長竹內好的推動下，雜誌以平易近人的文體試圖增進讀者對話，其編輯方針是標榜與民眾站在一起的「反菁英主義」，因而受到不少左翼社會活動家青睞。其後研究會成立就吸引不少左翼知識份子、運動家加入，而引發路線之爭；也曾出現美國資金贊助、日本公安介入「天皇制特集」出刊等情事而歷經改組、停復刊後，成為日本社會一股民間知識份子的進步力量。

從《思想的科學》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們籠統地認為知識份子對日常時局的針貶具有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特徵，即便是哲學、歷史學領域的專家學者也認同學術與ジャーナリズム有其相通之處，也常視ジャーナリズム為再現民間思想的形態之一。但同時也關注美國大眾傳播學，以及符號學運用在行動科學的研究等對人性的掌握方式。只是相較於大眾傳播中易受符號左右的「大眾」，ジャーナリズム代表的卻是著重在「民眾」思想的人性面與在地文

8 鶴見生於精英階層，16 歲就通過入學測驗而留學哈佛大學哲學系；其父佑輔是戰前自由派國會議員。討論轉向其實也是鶴見俊輔對於父親佑輔於二戰期間轉向支持翼贊體制的批評。

9 江戶末期發展出的一種大眾藝能，是以三味線為說書、評論、文藝談話等伴奏的即席說唱。

化潛能上，具有守護人性尊嚴的意涵。長期擔任主編的鶴見俊輔就是明確將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思想性託付於日本民間社會的代表人物，他主編的《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思想》就將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發展視為思想與言論的歷史，並從文化史觀點理解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意涵。內容包括戰前至今產學界對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思想性探索與實踐；前述內川芳美對ジャーナリズム的解釋就多少有該書的影子。

在理解ジャーナリズム一詞時，鶴見主張應著重 journal 這個具有記錄每天公、私領域的「日常性意義」；這點近似幕府末期民間社會發展出私領域紀錄的「日記文學」。鶴見由此推敲，對私領域或當時民間社會的紀錄應可理解為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本質。這種持續累積言論的工作並非一次性的，所以吾人應理解「紀錄的持續性」本身就是「有意義的思想活動」。對記（錄）者來說，應致力追究、觀測何為現今ジャーナリズム無法表現的內容。換言之，不光要正確紀錄當代事物，更要考察到底是什麼力量阻擋了民眾藉由「紀錄當代」抽取存於民間的思想。所以鶴見將委身「大眾傳播」的新聞工作稱之為「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而放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對立面。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會輕易地依從政經勢力而不斷出現言論、立場的轉向，且在大眾傳播計劃性生產大量訊息的情況下，大眾傳播事實上成了一種加速社會遺忘的意識形態裝置（有山輝雄，1995）；反倒是戰後創立的小報、雜誌記者較能為自己的報導負責。雖然批判社會通常是為了喚醒人們的記憶與思考，卻也背離了當代的言論風向，但這才是真正還原ジャーナリズム原有機能的作法（鶴見俊輔編，1965）。

然而近代報業在資本化、國族化後，日本社會就不再將ジャーナリズム比擬為日記了。鶴見認為明治時代大型報業的登場造就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小報的重要性下降，ジャーナリズム被理解為報紙、雜誌企業化後的工作職能，從而帶有企業言論特權的意涵。¹⁰ 不同於前述幕府末年到明治初期有段言論的百花齊放，政府在穩定時局後開始壓制報人言論，同時大眾報紙的出現造就大眾導向的ジャーナリズム，加上「講談俱樂部」將口語言談直接放入文本，都創造出連載偵探小說在「大眾時代」的銷售佳績；緊接「大眾雜誌」的成功讓報刊累積資本成為中大型企業。但煽情化的大眾化報刊也讓「新聞公害」層出不窮，又報刊為了生存而與政府共創軍國主義的美談，

10 這可說是呼應了小野秀雄的新聞學建制工作。而相對於小野對「新聞學」的執著，遍讀鶴見著作卻不見「新聞學」一詞。

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増幅的人性慾望終將日本推向了萬劫不復的侵略戰爭（鶴見俊輔編，1965）。

二戰後雖然進步派知識份子盼能改革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但迫於美國佔領軍管制輿論的壓力，日本新聞協會於1948年發表有關「確保新聞編輯權的聲明」，仍讓編輯權落在企業主手中，這斬斷了記者與ジャーナリズム間的連結（鶴見俊輔編，1965，頁28）。接著50-60年代日本大眾傳播產業蓬勃發展，為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提供合理的存在條件，且美國傳入的大眾傳播一詞也廣泛被日本社會視為民主政治的基石，但同時大眾傳播似乎指向的是新聞、廣播、電視、電影、大型雜誌等從業人員，其他人則成了「烏合的受眾」。鶴見批判該現象為「傳播萬能主義」¹¹，代表著從明治維新至今大眾傳播（報業）在面對國家與資本的暴力時，老是背棄民眾的態度（同上引，頁8）。不光是鶴見在《ジャーナリズムの思想》提到大眾傳播與ジャーナリズム的二元對立，1959年時任《思想的科學》雜誌主編竹內好所發起的「小報的會」，更是力主ジャーナリズム在市民社會的必要性。參與讀書會的有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教師城戸又一、稻葉三千男、共同新聞社記者新井直之，以及日後創立日本出版協會的吉田公彥等，其他也有新聞記者、年輕學者加入。除了討論時事、新聞史等，會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民眾自發創辦，極具批判精神的小報寄予厚望。竹內好自己也於《思想的科學》發表了〈小報的可能性〉，論及大報內容細分化現象正是小報崛起的好機。其他竹內也多次撰文舉例：對抗大報言論操作的學生報、《讀書新聞》在文化建設的重要性，甚至是讚揚主婦社團對報紙漲價的抗議等（竹內好，1981），都可看出研究會的態度是期待民眾能在報業發展史中扮演要角。

但在研究會呼籲重視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當下，卻有著60年代言論環境日趨複雜的背景。首先政、財界對高度商業化的報業進行了一連串的「偏向攻擊」。這是對不利自己的新聞報導，透過公關宣傳的手法大肆批判，並製造其他新聞觀點來混淆視聽；最後則是將特定媒體貼上「偏向媒體」的標籤化做法。且美國政府也會直接對反越戰的新聞媒體展開言論攻擊。對此，大型媒體企業多半傾向自我規範，而強調新聞報導之中立性而非獨立性；這也間接導致主流媒體逐漸接受美日軍事同盟的立場。緊接著保守勢力以投入大量廣告贊助的方式，強化與媒體管理階層的合作關係，1970年又在商界主

11 經由記者等專業人員生產的內容必能傳遞到每個人心中；或是把寫好的文稿經由大眾傳播機構向社會傳遞，就能達成社會進步的幻想。

導下成立了政府外部法人機構「日本公關中心」，負責政府、商界的輿情操作；尤其利用新媒體「電視」操控言論大獲成功。總之，從 1960 年代的日本言論史來看，最重要的特徵是大眾傳播媒體缺乏獨立性，大環境並不存在拒絕言論壓力，並對壓力採取明確對抗態度的經營者（內川芳美、新井直之編，1983；根津朝彥，2019）。

肆、作為抵抗的傳播隔閡

伴隨大眾傳播環境惡化而來的是 1960 年 5 月美國強壓下通過的新安保條約。當時研究會除了公開批判政府獨斷，也因鶴見俊輔呼籲多元思想交流的「無黨派市民革命」而受到社會矚目。鶴見隨後也與夥伴創立了象徵民眾聲音的「無聲之聲的會」，強調落實憲法保障市民權，提升市民個人生活福祉的目標。在法治的前提下，鶴見反對當前知識界將日本社會的主要爭論放在：究竟應走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上，主張應時時刻刻與現狀互相對照、組合、協調，進而找出政治、社會運作的折衷辦法，才能建設性推動社會發展。他稱之為出自民眾多元性思想的「折衷主義」，盼民間力量能反制政府在安保締約前後不斷強調的美國軍事力。而這也是他歷經轉向的共同研究後所得出的一種「消除對立的辯證法」。這點可從研究會並無會員的「除名制」看出，如果為了維持理念的正統性而將會員除名，就無異於獨佔「真理」的日共了。加上他們認為自己既是知識份子，也是身處日常生活的民眾，彼此間應存有共同的對話基礎與實際感覺才是。這與左翼運動中堅持的理論鬥爭，將知識份子與大眾區分的主張大相徑庭（橫尾夏織，2006）。

「無聲之聲的會」後來促成 1965 年「越南和平市民聯合」的創立，這個戰後最具代表性的市民反戰團體雖逐漸左傾、暴力化，甚至接受 KGB 的金援等，這些都非鶴見俊輔樂見，但廣納多元參與者的態度與研究會揭橥的理念相同。在參與街頭運動的同時，鶴見同時致力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理論化工作。他從美學家中山正一 1936 年發表的〈委員會的邏輯〉獲得啟發，揭示了說話、書寫、印刷因各自媒介特性不同，其產生的邏輯也有所差異的角度申論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思想。他認為日常生活中民眾說出的言語是一次性的，具有當下時空脈絡產生的特別意義；如果言語成為被寫、被印刷的文章，就是從這個特別的生活史脈絡中脫離，而成為具備解釋功能的符號。該符號的目的只是為了傳達明確的主張而已（鶴見俊輔編，1965）。然而，

言語被紀錄後文本並非就此完成，鶴見進一步申論，說話、書寫、印刷之間，相互關聯的每個階段都應該是動態的言語過程才是。

換言之，生活中透過言語，或通過各階段不斷往復的傳播會形成民眾傳播活動的循環，當時研究會就致力將這個循環做成生活紀錄。如果想記錄民眾談論自己的思想轉向與否，就必須試圖捕捉思想的動態；而這正是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重要工作與特徵。在 50 年代的當下，同為研究會成員的竹內好就力促民眾「戰時體驗」的文字化工作。以鶴見來說，他自白戰爭期間擔任軍職時，曾在心裡盤算：如果長官叫我殺俘虜，自己該怎麼做？是起身反抗呢？還是自殺？抑或是依從呢？他慶幸自己並未遭遇這個難題，雖然內心希望日本戰敗，但他也擔心被同事識破，到時應如何決斷呢？這種心理現象也反映在鶴見對戰爭責任的看法，就是對「個人」戰爭責任的重視。他反對以歷史來規避個人責任：「因為在歷史的洪流中大多數人都是如此，所以我也只是跟著大家一樣而已」（橫尾夏織，2009，頁 184）。

總之，研究會關注描述戰爭的個人體驗與責任，其內容有著濃厚的情感對話色彩。譬如他們認為研究者應靠近、觀察轉向者的狀況，將這種理解個人戰爭體驗的方式稱之為「追尋體驗」，藉此來達成「戰爭體驗的一般化」（竹內好，1980，頁 231）。這種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作法是希望藉此繼承戰爭、轉向的親身體驗，以成為後代的遺產。「追尋體驗」雖看似缺乏科學方法，但鶴見倒是認為這種為當事人設想的方式較能深刻解讀資料，也可說是承認「思想浮動性」的思想史方法論。當然，這種作法與當時同為反帝國主義陣營的日共知識份子有明顯的差異。尤其日本左派運動中有著自我批判的傳統，認為一旦自我批判就能得到救贖，鶴見反批評這只不過是順應歷史隨波逐流的「轉向」罷了。加上自省的傳統卻被戰中少數入獄的「非轉向者」的情操綁架，又戰後日共過度專注理論鬥爭以爭奪黨內主導權等，都導致馬克思主義信仰被僵化為「原理」、「原則」旗幟下的思想操作，並無法理解當下民眾的狀況（藤田省三，1998；轉引自橫尾夏織，2009，頁 189）。

為何鶴見、竹內等研究會成員堅持立基在個人體驗的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民眾思想，以及這些在追溯戰爭責任時的有效性呢？以鶴見的角度來說，除前述參與的市民運動外，也與他在語言學、傳播學、民俗學的研究有關。1946 年在《思想的科學》雜誌創刊號中他就發表〈針對言語的自保性使用〉一文，關注戰爭前後人們的思考、行為如何被當時「言語的使用」所影響。其研究動機來自於戰爭體驗，反省戰爭時期日常言語被政府、媒體操作，進

而限制民眾思考與行動的現象。在方法論上他採取留美習得的邏輯實證主義 (logical positivism)，研究戰爭時期代表性的假命題「鬼畜 (泯滅人性的) 美英」一詞。他認為這是將「假命題」視為「真實」，讓日本國民藉著使用「鬼畜美英」來達成極權主義下日常生活的自保。雖然「英美是鬼畜」形式上是作為主張的命題，但實際上說話的人憎恨英美的情感狀態卻是在當時的社會狀態下被表現，而非陳述自親身經驗的事實；但人們卻無自覺地將該陳述視為事實的命題，顯示言語本該代表的意義並未被清楚且自律地使用，反而是作為當下為求自保的假命題。這種用法來自社會霸權認可的價值體系，相關言語的流通造成戰時民眾集體「不思考」，而戰後日本在美國接管下轉向為民主主義國家之際，「民主主義」也成為不假思索、只求自保的假命題 (鈴木園巳，2010)。

但隨後鶴見有關言語溝通的研究，開始從「邏輯實證主義」轉為「實證主義」取徑，主因是他在「菅季治自殺事件」後反省了方法論的限制，關於該事件的論述發表在〈兩個哲學家杜威與菅季治〉，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使用日式造語「傳播隔閡」(dis-communication)，藉此反思前述傳播萬能主義的謬誤。傳播隔閡的詞彙，是鶴見藉由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的傳播理論所創造，一般指言語在傳播過程中出現意義與行為的偏差，以及無法傳達意義的現象。這雖非英語學術圈的正式詞彙，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流通，在日本社會學界的溝通理論、印象論，以及心理學中也是常被論及的概念 (寺田征也，2018)。

曾在京都大學專攻哲學的菅季治 (1917-1950) 在敗戰後成了蘇聯俘虜，因通曉俄語而在蘇聯收容所擔任翻譯，他在引揚歸國¹² 的隔年被眾議院傳喚作證後自殺。事件背景是美國佔領政策逐漸向右靠攏，日本國內出現「赤色清洗」風潮，而當時在蘇聯歸國者間卻普遍流傳：「日本共產黨書記長德田球一曾要求蘇聯說，日本俘虜中有反動人士，別讓他們歸國」的謠言。菅被國會要求證明是否屬實。菅說，他在蘇聯居留地被日人俘虜問到何時能歸國，他將蘇聯政治部的回答直接翻譯成日文說：「你們在這邊正直的勞動，在成為『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後就可以回日本了」。實際上德田是否如此說，他無從得知，但議員們卻要求菅對這個脫離事實的問題做出解釋。「真正的民

12 此詞彙日語為「引き揚げ／ひきあげ」，原意為「拔出」，引申為「撤退」之意，在歷史背景下特指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原居於日本在海外各殖民地及佔領地的日本國民陸續遭遣送回日本的歷史事件，而回到日本人又被稱為「引揚者」。戰後中華民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稱為「日僑遣送」、「日俘僑歸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稱作「日本僑俘遣返」。

主義者到底是什麼意思」、「這真正意思是將共產主義視為民主主義吧」，議員們早已認定菅是共產黨員，他的翻譯必定會扭曲事實。菅在極度絕望下帶著《蘇格拉底的申辯》一書臥軌自殺；鶴見認為這象徵著「說了就會懂」的傳播神話破滅，菅與杜威理想的傳播過程並不存在（鈴木園巳，2010）。

杜威認為傳播是人類運用言語相互傳達思想與情感，並為雙方帶來共同意義的一種全身性活動；而他將傳播稱作文化樣式的說法啟發鶴見日後的研究，尤其是民眾經由日常生活溝通而內化形成的民眾思想，是否在傳播學有發展的可能性。然而，鶴見的傳播隔閡論卻是藉著菅季治的悲劇來批判杜威的傳播理想。鶴見說：他可以理解杜威想以傳播連結人心、實現社會進步的善意，但社會的衣食住行勞動的基礎條件並未改善，優化傳播條件只能說是次要手段（寺田征也，2018）。鶴見對「傳播」的用法可說更仰賴日常生活中社會互動的經驗與文化樣式。他認為思想、宗教、藝術等文化領域的言語問題都與傳播相關；而傳播是將心情、想法向外傳遞的方式，也是兩個以上的動物間彼此共有意義的狀態。所以傳播當下必然會帶出區分你我的認同問題，這與參與者在生活水準、階級、民族、國家、性別的差異高度相關。

當然不只是杜威，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一直到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都希望能以理想的對話模式追求真理、形成共識。但傳播場域本質上就有易受權力影響的特性，加上參與者慣習的差異，以及對話中有意無意的摩擦與誤解都會造成意義無法相通；即便是合理的傳播也常有情感上無法接受的情況（井上俊，2009；轉引自寺田征也，2018，頁 29-30）。總之，意義的共有會不斷出現龜裂，所謂理想的傳播模式或藉理性對話達成相互理解只能說是「傳播的神話」，而過度仰賴傳播效果可說是對傳播萬能主義的信仰了。所以鶴見主張傳播活動並非以追求傳播效果為目標，反而應以傳播隔閡的樣態顯現出來，當然在此就會出現因立場不同，而在言說場域中不斷再現雙重標準的情況。從國會議員對菅季治的質詢就可以看出，傳播過程中敵我間的傳播隔閡必然帶有對內寬容、對外嚴厲的雙重標準。所以傳播隔閡是世界的常態，不應視為傳播過程中應排除的脫序或噪音（noise）。因而主張所有傳播問題的研析都應同時納入傳播隔閡的觀點，才能積極讀取傳播過程的支配性符碼，並以參與者的角度與對方身後的場所、言語、世界對峙才是傳播本身。這個近似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觀點再次確認了社會的弱勢、少數族裔在傳播過程中的積極意義。

所以，要去除雙重標準除了理解整個傳播過程中的權力作用，更重要的

是接納傳播隔閡的觀點，進一步策略性地重新生產傳播內容才得以抵抗傳播萬能主義下意義被宰制的情況。他總結過去的研究認為，記號反映的現實並非只是單純的反映，其中也會顯示出社會利害關係的交錯；而言語與其指示對象間的連結，也並非是明確且安定的，反而應將言語視為與支配性力量相互衝突，爭奪意義解釋權的場域才是。所以在面對傳播現場中壓倒性的權力失衡時，藉由傳播隔閡的觀點可說是否定了意義的共有狀態，非主流在面對主流單方的壓倒性論述也應積極地作出策略性詮釋，來抵抗傳播過程中意義被掌控且對傳播效果過度追求的現象。而這種方式不同於日共、女性主義者明確區分敵我，再造屬於自己詮釋世界的「雙重標準」，形成永續對立的局面。反而是以在地文化重新生產意義、刻意誤讀的方式不斷再現日常生活，進而反轉詮釋的霸權。

在此，鶴見借用在地文化、次文化內部本來就具有抵抗「普遍性意義（主流文化）」的傳統，說明墨西哥人藉在地化方式重新再現、詮釋天主教的象徵性儀式就是一種積極運用傳播隔閡的方式（鈴木園巳，2010，頁 277-278）。從鶴見當時面臨的歷史情境而言，提出傳播隔閡可藉此意識傳播場域中運作的權力，再以在地民眾思想與行動來推動歷史的進步與變革；具體來說就是超克戰後美國帶來的近代化，以及前述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大眾傳播）帶來的支配性力量。同時傳播隔閡也揭示了傳播過程中「批判」的合理性，以及重視與多元他者間的協調，而避免宛如戰時軍國主義過度強調集體認同的傾向。加上他在 50-60 年代參與社會運動鍛鍊出的行動力，並從中發現民眾存立的基礎來自人們日常傳播活動的連結性與多元性，藉此才得以發展出前述市民運動的「折衷主義」。總之，在當時「逆進程」的情境下，他的傳播隔閡論並非是純粹的理論或主題式探討，而是藉由親身參與、體驗的一連串事件中不斷修正得來的。

當然，傳播隔閡也要民眾能意識到日常生活中有源源不絕的言說「素材」，才足以對抗支配性的言語控制；而這也促成他當時對民俗、次文化的關注。他舉塗鴉、祭典、繞口令、改編歌詞、哼唱歌曲、展演等日常生活重複的儀態或言語活動，這些廣泛在日常生活中再現的審美經驗，也是生活與藝術重疊的「邊緣」美學（鶴見俊輔，1967），都充分反映在他堅持的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上。其後在 1988 年編輯《傳播事典》一書時他更大量編入有關場所表意的詞彙，其中對日語「動詞」的解釋生動描述各種日常生活場所的思想動態，都可謂是日本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基礎（鶴見俊輔、粉川

哲夫編，1988)。對照小野秀雄將濃厚民俗色彩的「瓦版」新聞史導向具學術建制、國家統制色彩的「新聞發達史」研究；鶴見的工作可說是再次讓新聞學重拾再現民眾生活紀錄的初衷，這些紀錄也成為探索民眾思想，反抗意義受宰制的重要言論素材。

伍、竹内好的ジャーナリズム與戰爭責任

至此可看出，反思戰爭、追究戰爭責任是戰後知識份子面對學問與時局的重要課題。鶴見俊輔是以實證主義哲學追究與時代交關的言語、傳播、文化議題來參與時局；也因此他極為重視ジャーナリズム這個再現民眾思想的重要型態。這種立基在地民眾日常經驗的治學態度與同為研究會成員的竹内好頗為相似，只是竹内的做法更為激進，尤其在面對自己的戰爭責任時，竹内更以製造「傳播隔閡」的方式開展獨特的ジャーナリズム思想。雖然鶴見並未言明自己的論述是否受竹内影響，但在研究會中鶴見與年長 12 歲的竹内互動頻繁，鶴見也承認遍讀竹内作品，足見竹内引發的言語風暴必然會刺激鶴見。雖然耕耘的學術土壤不同，但從兩人極力反對美日安保的態度來看，他們都是站在民眾立場而積極參與時局、對抗美日政府。¹³ 當 1960 年竹内為抗議日本政府而辭去東京都立大學教職的「公務員」身份時，鶴見雖表震驚，卻隨後跟進辭去京都大學教職。兩人採取的都是民間知識份子在體驗戰爭後，無法將自己置身事外的做法；同時也是他們不求自保，將自己置於時局中心而負起戰爭責任的獨特方法。

關於竹内好的研究，華人學界大多藉他詮釋的亞洲主義、近代超克等這些在戰前饒富侵略意涵的字彙與論述，理解戰爭發動背後的思想動能。不過，具浪漫主義色彩的竹内藉著魯迅的自我否定思想，形成獨特的文學態度，由他重新建構的這些爭議性極高的語彙，當然也引起包括日本、大陸學界對軍國主義復辟的警戒。如同開頭所述，卓南生藉井上清質疑竹内「戰爭二重性」與「戰爭責任」的雙重標準立場等，反映了華人學界對歷史修正主義的憂心。但從井上於《戰後日本的歷史》一書中批判竹内的原文來看，井上並非僅質疑竹内，而是將鶴見俊輔與竹内好歸為一類，顯見井上並不贊同兩人在「思想的科學研究會」中呼籲莫將投入戰爭的犧牲浪費，活下來的人應繼承這場戰爭體驗進而形成思想等（竹内好，1980，頁 212），井上反駁：

13 兩人對美日安保的討論可參照《狀況的：竹内好対談集》（竹内好，1970）。

首要之務應是全面否定戰爭……難道是要用帝國主義的傳統來形成帝國主義的思想嗎？還是要從反帝國主義來形成反帝國主義的思想呢（井上清，1966，頁 20）。

且竹內在戰後初期一邊與日共合作，一邊又強烈批判日共在思想和行動理念中隱含的進步主義、奴隸性、天皇制色彩（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編，2007，頁 62），自然會引來不少撻伐。加上文學家、思想家與史學家各自描述、參與戰爭的經驗都有所差異，其相互批判不足為奇。

雖說如此，竹內好的文學性的確高度爭議，就連鶴見俊輔也曾一邊提及竹內加入研究會的重要性，一邊又指竹內是支持大東亞戰爭的爭議性人物（鶴見俊輔，2005，頁 220）。且鶴見的哲學背景讓他在戰爭體驗的相關論述中對情感的描述較為保守，也曾對竹內的「戰爭的二重性」抱以懷疑卻又未全然否定的曖昧態度。總之，即便是戰友都曾質疑，更不用說是論敵的井上清了。在《戰後日本的歷史》中，井上對竹內等人的批判清楚明快。他說，放眼戰後日本產官學菁英所推進的「逆進程」，顯示日本並未深切反省戰爭，尤其論壇或學界都瀰漫著：大東亞戰爭是從歐美帝國主義手中解放亞洲的聖戰。這種為帝國主義辯護的手法也包括竹內、鶴見所主張：「到頭來結果是好的」類型。井上批評竹內將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包裝為大東亞戰爭是意圖實現亞洲各民族共榮共存、解放亞洲的聖戰，將導致無法區別這究竟是「侵略戰爭」還是「民族解放戰爭」。他強調帝國主義間的戰爭並無法實現解放，應在與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中獲得勝利才能達成解放；他反對竹內好所說：大東亞戰爭同時具有「對殖民地的侵略」與「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二重性」，認為兩者應有區隔（井上清，1966）。

對井上清的說法，竹內好以 1966 年發表的〈針對學者的責任〉¹⁴一文回應，批判井上在引用時並不了解文章整體脈絡，而在抽離片段後曲解了原意。竹內批評將侵略與連帶切割的二分法來自日共獨善其身的黨派特性，論述有可能「被支配者的意識形態利用，而有發動攻擊的危險性」，也有可能「作為支配者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但這兩者是不同的。竹內說，也許對馬克思史學家而言，「人類的動機與手段的區別是明確的，是可以由他者完整掌握的透明實體」（竹內好，1980，頁 273）。但對竹內而言，人類是處在流動且不斷變化中才得以掌握自我與他者。也因此他認為歷史是可塑且得以分解的

14 原文〈學者の責任について〉刊登於 1966 年《展望》雜誌 90 號，本文引用於 1980 年出版之《竹內好全集（第 8 卷）》。

建構物（竹內好，1980，頁 273）。但從當時「逆進程」中戰後歷史學、歷史教育發展的混亂期來看（遠山茂樹，1968），竹內的說法對井上而言卻是「歷史修正主義」的常套。又如卓南生當時觀察，新聞媒體的議題設定也巧妙呼應戰前皇國史觀，加上當時社會對舉辦「明治維新百年慶典」熱烈討論（1968 年），美國駐日大使愛德溫·賴肖爾（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盛讚「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與中國近代化的失敗」，言詞顯露的美國近代化史觀，都同樣受到竹內、井上在內的進步派知識份子高度警戒。

在傳出日本政府有意慶祝明治維新百年前，其實早在 1960 年，竹內好就撰文贊同評論家桑田武夫於 1955 年重新評價明治維新的主張，並在《思想的科學》引發了一連串討論。而這正反映當時日本社會意圖回復民族自信的集體心態，竹內一邊為此感到困惑，一邊也為文說明如何評價明治維新，將反映出日本近代化的矛盾爭議。

明治維新還未結束……而明治維新形成的國族主義也未被清楚的解釋，而這可說是國家形成的失敗案例（竹內好，1980，頁 242）。¹⁵

竹內表示重新評價明治維新「並非懷舊的興趣，而是一種邁向未來的戰略性提案」。針對這個具有ジャーナリズム特徵的問題意識，當時進步派的批判集中在竹內右傾的立場問題上，加上當時社會有著不再是「戰後」的氛圍，而深化了知識份子對淡化戰爭記憶的不安等；都讓批評者無法理解竹內所言：「日本當下對明治維新成果的理解只是其中的一種可能性而已」（竹內好，1980，頁 238）；或是竹內明確反對明治維新本身代表「日本近代化成功而中國近代化失敗」的賴肖爾式語境，尤其他指出「討論明治維新就必須討論敗北」更是一反歷史常規的反語式陳述。他以《孫文選集》中「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而中國革命是日本的第二步」，高度評價中國革命失敗的價值，藉此論證革命失敗的必然性。他認為「辛亥革命是名符其實的革命，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正因為明治維新是反革命的革命」（同上引，頁 344-357）。換言之，竹內認為戰後中國近代化的停滯是為了抵抗西洋文明，反而日本是在沒有抵抗下成功文明化，也因此自我消失了；而自我認同不存在的狀況就不會出現混亂，國家只要專注經濟發展就好（柄谷行人，

15 原文刊登於 1965 年 5 月 17-18 日《東京新聞》，本文引用於 1981 年出版之《竹內好全集（第 8 卷）》。

1995)。

所以，竹內好當下所指「中國革命才是成功的近代化，而日本的反革命卻是失敗的近代化」是一種對現況的完全否定，也是與主流社會認知的意義完全相反的議題設定。這看似無謀的舉措是出自於他意圖反對安保條約讓日本處於「精神上的奴隸」狀態，他將自己置於宛如前述鶴見俊輔所言「傳播隔閡」的主角菅季治一樣；竹內反對官僚主義宰制言語的常套，而刻意將自己投身言語風暴中心，這不僅帶有其浪漫主義的文學思維，在當下更有擾動社會、喚起運動的意圖。他認為美日安保不僅會將亞洲的戰爭固定化，而協助美國讓亞洲處於冷戰狀態也代表日本並未反省戰爭。

所以，竹內好主張日本對亞洲各國應保持政治的獨立性，在反對安保的當下他寫了〈日本與亞洲〉、〈日本的亞洲主義〉兩篇頗受爭議的文章，內容不僅提出亞洲作為對抗西洋根據地的理念，也透露過去日本面對亞洲有其自主性，而這也導致其言說有被右翼援用的尷尬。文中雖提及過去日本亞洲主義者所言的「亞洲主義」事實上就是侵略（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編，2007，頁 107）；而皇國日本轉為法西斯主義、大東亞新秩序建設轉為殖民侵略、鬼畜美英轉為民主自由等，都是在戰爭下言語被當權者、官僚主義反轉、侵蝕的結果（同上引，頁 112）。不過，他也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現實上，自己同時主張「亞洲主義」具有孫文所指的連帶意涵，的確有其矛盾。也因此他說：從明治維新時「征韓論」被提出以來，日本與西歐主導的近代世界都是站在帝國主義秩序的基礎上發動殖民地侵略戰爭，這與日本同時主張超越西歐近代，站在東亞建立獨自價值是相互矛盾的（岡山麻子，2002，頁 271）。然而，為解決這個「戰爭二重性」的矛盾，竹內認為不應單純的從結果來看，簡言之，他不認為將「侵略的錯誤性」與「連帶的正確性」視為兩種分開的邏輯，而將批判的砲火集中在侵略的錯誤上；反而應承認兩者具有相生相剋的特徵，藉此思考侵略戰爭的本質，當然這也為他帶來並未全然否定戰爭的批評。

為面對這個日本近代思想史的難題，他採取的是當時亟需勇氣的言說策略，以一名中國文學研究者、評論家的立場試圖打破官僚主義¹⁶壟斷下言語的常套用法。他認為延伸戰前饒富軍國主義色彩的「近代的超克」相關論述，能為戰後民主萌芽之際的日本建構近代的自我、個人的主體性，如此一來民

16 這是由國家、政府、學界、產業界的合作下對言語、知識的掌握與支配，意圖由上而下的傳遞訊息，而非民眾由下而上的理解方式。

眾就不會如同戰前一樣配合高層發動侵略戰爭了。另一方面，為立足亞洲，他將亞洲相關論述立腳在與日本近代化路徑完全相反的中國，他認為日本既要立足東洋，又要靠攏歐美，所以日本變得什麼都不是，日本應徹底站在亞洲，尤其是站在曾經侵略的中國立場上才是。在亞洲，近代的指標不應單以歐美為基準，他觀察中國的革命，認為中國是同時通過保存、否定自己才得以在內部形成新的主體性，他稱之為仰賴內部力量的內發（展）型「回心」文化，是奠基在民眾內部自律性的近代化路線。反之，日本則是易受外力改變的外發型「轉向」文化（岡山麻子，2002，頁 272）。他將回心的理論據點置於魯迅的相對自律性的論述上，而強烈排斥論述的絕對性（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編，2007）。對竹內來說，徹底反省戰爭責任當然不會是錯的，但如果這絕對化成為菁英獲取政經利益的「政治正確」，而僵化了反省戰爭的方式，那與戰前言論極端受限的情況就無二致了。

所以，竹內並不撤回他在〈大東亞戰爭吾等之決意〉中具參戰浪漫主義的言論，而選擇接受論壇的批判。他對自己當時陳述的戰爭體驗並不感到羞恥，反而認為真正的屈辱是未深刻地從民眾思想的角度反省戰爭（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編，2007）。所以他負起戰爭責任的方式就是徹底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因為這延續了二戰期間視中國為假想敵的狀態。這點也可從他戰後解甲歸國一個多月就批判《中國文學》雜誌看出；他認為該誌副刊以「戰前的文學歌頌太平洋戰爭是一個愚蠢的錯覺，是一時的興奮」反省了文學家的戰爭責任，但竹內卻認為這反倒省去檢視個人在當時為何會做出如此判斷的過程。這與全盤否定歷史、戰後盤據政經高位的轉向者一般，反省戰爭只是想從中獲利而已，並非從思想、實際感受上，細緻地處理戰爭責任（岡山麻子，2002），當然，轉向終將無法回復日本的主體性；不論日本是轉向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對竹內來說都是西方強逼自己表態的近代化方式罷了。

但如同思想家柄谷行人所言，當時日本亞洲的論述只剩下脫亞論跟馬克思主義的亞洲觀而已，而這兩種觀點都過於強調亞洲在近代化的落後性上。在日本與亞洲處於分隔，且在逼人表態的言論環境下，竹內好提出的戰爭有其侵略、連帶的二重性，極為容易被貼上肯定侵略的標籤。這是一種愈是憎惡侵略的事實，愈是不易關注侵略過程中相生出的連帶感，而將之一併否定的逃避心理（柄谷行人，1995）。而竹內認為醞釀與亞洲的連帶感正是戰後緊貼美國的日本所需要的。雖然竹內的連帶論的確具有回復國族主義的意涵，但卻是藉由文化改革來反思近代化在日本帶出的問題，盼能從民眾的戰

爭體驗中「由下而上」地找回屬於日本的國族主義。以鶴見俊輔的說法就是意圖回復立基在民眾日常生活的國族主義。而竹內的做法卻是：

要避免落入極端國族主義，就應進入極端國族主義的論述脈絡裡，把隱身其中真實的、健全的國族主義抽離出來（遠山茂樹，1968，頁 115）。

尤其應從否定一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語彙用法與解釋開始。包括「明治維新」、「超國族主義」、「亞洲主義」，以及文學評論中竹內對「國民文學」、「支那」等字眼的使用，都是固執地延續戰前的論述脈絡，再重新以民眾的日常生活與戰爭體驗來加以思索、詮釋，而非一刀切開的全盤否定這些語彙。然而，這也因此讓自己成為井上清們所攻擊的極端國族主義者。竹內主動、刻意地將自己置於言語風暴中心，不僅以參與、挑起論辯的方式，更採取民眾敘述戰爭體驗的方式來打破產官學、黨派對言語、意義的限制與宰制。這種幾乎是與世界為敵的言語策略正是盼望能回復言語在歷史中的脈絡，而非戰後「轉向」的去脈絡語境。

但如竹內好研究者孫歌所說竹內設定的目標極為困難：

竹內注定失敗。戰爭作為一個伴隨血腥和死亡以及人類獸性暴力白熱化的複雜事件，很難直接為竹內好提供以『文學』代替哲學的機會……世界的文學化，意味著世界在自我否定的過程中不斷自我更新和創造，只有建立了這樣的基點，這個世界才會真正理解文學（孫歌，2001，頁 173）。

從竹內好重新建構語彙在思想上的脈絡來看，主流社會不僅藉由（侵略的）歷史否定了歷史的脈絡，也運用大眾傳播否定了民眾藉由日常生活體驗的、反思的、文學的ジャーナリズム，限制了今日民眾思想「再脈絡化」的可能性。從前述鶴見俊輔對傳播隔閡的理解推論，鶴見應能同意竹內試圖對抗「官僚主義」對意義的掌控，期能創造意義的連續性與延展性。但鶴見的哲學訓練讓他在理智上並無法同意竹內「將世界文學化」的做法，只能從自身對傳播隔閡的關注，來理解、描述大眾傳播追求傳播萬能主義的暴力性。鶴見尤其以傳播本質上無法完全傳遞意義這點，強調ジャーナリズム作為思想活動的重要意義。

而從兩人的共同主張來說，思想、言論的價值應在於作為掌握思想動態

的素材，而非單純作為明辨是非對錯的史料。「思想的科學研究會」這種試圖以文學、民眾思想史取徑描述日本人內心的糾結與感受，與主張歷史早有答案只待發掘的唯物史學家井上清，以及遵循「論從史出」的新聞史學家卓南生看法完全平行，卻也著實揭櫫戰後日本ジャーナリズム作為民眾思想再現，對抗意義宰制的另一篇章。

陸、重建新聞學的思想性邏輯

在《東亞新聞事業論》中，卓南生的核心關注為：「帝國主義者的雙重標準與新聞事業（學）的戰爭責任」；這精準地指出戰後日本最重要的思想課題。他也藉其新聞史研究、時事評論貫徹其實踐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精神；尤其數十年旅居日本期間以時評呼籲日本人反省戰爭、破解日本保守派政客延續二戰時的軍國主義思維，再再顯示他作為知識份子的勇氣與意志。然而，本文也認為書中引用井上清批判竹內好提出的「戰爭的二重性」等論述，並無助於日本社會破除敵我間「對內寬容、對外嚴厲」的雙重標準。於此，藉著梳理「思想的科學研究會」，尤其是鶴見俊輔、竹內好的理論與實踐工作，說明研究會在處理「戰爭責任」的態度與作法與ジャーナリズム高度相關。若能將這段歷史結合《東亞新聞事業論》提出的核心關注與相關論述，¹⁷ 應可為華人社會回復新聞學的思想性邏輯提供參考。

雖然井上清、家永三郎（1913-2002）¹⁸ 等左翼史家在當時一致批判竹內好立場模糊，日本作為加害者的自覺不夠，卓南生更直指這將墮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歧路。但對於發動戰爭的日本人而言，竹內好與鶴見俊輔認為要做的不單是否定侵略戰爭的歷史而已，一刀兩斷的否定反倒合理化了「轉向」的過程。日本在聯軍佔領、美日軍事同盟的壓力下做出民主、自由、進步的歷史選擇之後，也就模糊了對共產、專制、落後的亞洲諸國的戰爭責任了。換言之，「轉向」作為一種「利用歷史來否定歷史的工具」讓日本社會失去徹底反省戰爭的機會。在此，研究會主張應進一步反思合理化戰爭行為的現

17 以本文的論述來說，卓南生的言論今後也將成為竹內好、鶴見俊輔所言：「思想的材料」。

18 家永三郎自 1955 年以來就因文部省介入歷史教科書內容而與政府針鋒相對，他與日本政府針對教科書內容檢定的裁判受國際矚目，成為討論言論自由的重要案例。雖未與竹內好深交，卻於爭訟期間收到竹內鼓勵的書信。日後家永三郎於 1985 年出版的《戰爭責任》一書詳實紀錄日本於侵略戰爭中造成的傷害，明確說明日本應負的戰爭責任，而批評竹內好的抽象論述不易理解（家永三郎，1985）。而家永三郎也是日本少數願意證明日軍二戰時期南京大屠殺及其他戰爭暴行的歷史學者。

代化知識體系，以及以體系為生的知識份子、新聞人在二戰前後的轉向。而戰後的ジャーナリズム就是從反思現代化「新聞學」的學術建制開始，回過頭從西化以前的民俗學視角，視ジャーナリズム作為日常生活記錄的思想實踐，進而反思社會集體轉向的謬論。在戰後各方政經勢力逼人表態的情況下，研究會梳理知識份子的轉向歷程可說是反思社會的精準做法，充分展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批判性精神。

但因每個人的戰爭體驗不盡相同，對戰爭責任的理解也有差異，因此研究會藉由對戰時思想狀態的描述，收斂在以個人為單位，主體性地回顧戰爭體驗上。這些體驗扎實地反映在竹內好與鶴見俊輔各自表述的「傳播隔閡」之中，不同於竹內以「世界的文學化」將自己置於言語風暴中心的「火中取栗」做法；鶴見則是進一步聚焦在文化的再生產上，為形成民眾思想提出建設性做法。在面對言說霸權採取雙重標準的策略時，傳播隔閡以日常民俗、藝術、文學、ジャーナリズム等，重新再現、詮釋主流社會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與話語；但其再現路徑卻是循著政經權力的周邊，由下而上的處理戰爭、西化帶來的思想課題。而在現今資訊操作激烈的「傳播萬能主義」環境下，民眾思想、ジャーナリズム仍舊散見於電視節目中搞笑藝人的閒聊、雜談與落語，¹⁹ 以及在民俗文化活動中對生活的反思，社區報紙、學生、社會團體的刊物、漫畫、小說等出版中，甚至是隱身於主流媒體中不起眼的版面裡都有其蹤跡。而過去鶴見俊輔提出的「廁所塗鴉」則是能對應網路社群媒體的留言。這些作為民眾思想的材料，不斷傳承著對抗主流言說的能量。但即便如此，區隔內外的雙重標準依舊不會消失，這是因為言論被主流社會霸權宰制的情況仍會存在，以竹內、鶴見的體認來說，面對這個狀況應運用傳播隔閡的原理與日常生活中被宰制的言語搏鬥，這不僅再現言語霸權，也能讓民眾理解東洋與西洋、主流文化與次文化，甚至是男性與女性間二元對立的思想浮動性質。

所以，卓南生強調的「雙重標準」是二元對立下設定區分你、我邊界的問題。而這個邊界的形成來自主流社會的慣習，包括了既有的世界觀與內化成民族意識的現代化知識體系。也因此東方社會的學術在現代化過程中除應體認吾人工作不僅是從西方帶進新的、科學的、優勢的作法外，應可關注竹內好所言，明治維新只是日本現代化的其中一種可能性而已；而日本既有的

19 這宛如華人世界過去以相聲、雙簧等民間藝能評論日常生活、政治時局一般，其言論更能激發民眾思考。

文化成果大部分都是由外部移植而實現，文化生產缺乏主體性意志，這種未經與傳統價值對立過程的轉向並無法產生新的價值等批判。卓於書中也多次提到：過度追求西方理論的舶來品並無法脫離西方的宰制；也提醒新報²⁰稱揚西方知識先進性的同時，也建構了帝國主義的雙重標準。知識份子應隨時警覺西方知識體系的暴力性，反抗的首要之務應立基在歷史學考證調查而來的事實之上；以歷史作為認清現實狀況的基礎，進而建構批判的邏輯。

卓南生不贊成新聞學追求的事實能以抽象或觀念性的討論來探究，但如果新聞文本可以作為解析思想、辨別是非的材料，那就無法全然否定竹內好這種強調思想的浮動性、無窮性，以及再現的事實並沒有絕對答案的說法。若且華人學界中「新聞事業（學）」作為思想實踐的可能性還在的話，那新聞的文學化、文化化、民俗化的想像力、感受性就應然存在。如同「思想的科學研究會」實踐的，也或如左派先行者成露茜倡導社會文化取向的新聞史研究一樣（夏春祥等人，2010），新聞事業（學）除了強調實務、規範性邏輯外，於思想性邏輯的再生，應得以讓新聞事業（學）作在地思想浮動性的觀察者，進而成為民眾由下而上參與文化改革的助力。

20 因有別於過去政府發行的官報而稱之為新報。

參考文獻

- 小山榮三 (1951)。《新聞社會學》。有斐閣。
- 小野秀雄 (1949)。《新聞原論》。東京堂。
- 久野収、鶴見俊輔編 (1969)。《思想の科学事典》。勁草書房。
- 内川芳美、新井直之編 (1983)。《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ズム：大衆の心をつかんだか》。有斐閣。
- 戸坂潤 (1936)。《思想としての文学》。三笠書房。
- 井上清 (1966)。《戦後日本の歴史》。現代評論社。
- 竹内好 (1970)。《状況的：竹内好対談集》。合同出版。
- _____ (1980)。《竹内好全集 (第 8 卷) 》。筑摩書房。
- _____ (1981)。《竹内好全集 (第 12 卷) 》。筑摩書房。
- 吉見俊哉 (1999)。〈東京帝大新聞研究室と初期新聞学的知の形成をめぐって〉，《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所紀要》，58：45-71。
- 寺田征也 (2018)。〈鶴見俊輔のディ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論の検討〉，《明星大学社会学研究紀要》，38：29-41。
- 有山輝雄 (1995)。《近代日本ジャーナリズムの構造：大阪朝日新聞白虹事件前後》。東京出版。
- 有馬哲夫 (2008)。《原発・正力・CIA：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社。
- 佐藤卓己 (2008)。《輿論と世論：日本の民意の系譜学》。新潮社。
- 岡山麻子 (2002)。《竹内好の文学精神》。論創社。
- 柄谷行人 (1995)。《終焉をめぐって》。講談社。
- 松田武 (2008)。《戦後日本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ソフト・パワー：半永久的依存の起源》。岩波書店。
- 卓南生 (2010)。《東アジアジャーナリズム論：官版漢字新聞から戦時中傀儡政権の新聞統制、現代まで》。彩流社。
- _____ (2020)。《東亞新聞事業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編 (1959)。《転向：共同研究 上巻》。平凡社。
- 家永三郎 (1985)。《戦争責任》。岩波書店。
- 根津朝彦 (2019)。《戦後日本ジャーナリズムの思想》。東京大学出版会。
- 夏春祥、唐志宏、李明哲 (2010)。〈記成露茜教授 (1939-2010) 的中國新聞史研究〉，《中華傳播學刊》，17：75-91。

- 孫 歌 (2001)。《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巨流。
- 野村一夫 (1996)。〈ダブルスタンダードの理論のために〉，《法政大学教養部紀要》，98：1-30。
- 黒住真 (2014)。〈日本思想とはなにか〉，荻部直、黒住真、佐藤弘夫、末木文美士 (編)，《岩波講座 日本の思想第一巻「日本」と日本思想》，頁 3-30，岩波書店。
- 鈴木園巳 (2010)。〈ディ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鶴見俊輔の戦後と言語への関心〉，《言語社会》，4：267-281。
- 遠山茂樹 (1968)。《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岩波書店。
- 横尾夏織 (2006)。〈「思想の科学」における多元主義の展開と大衆へのアプローチ〉，《早稲田大学社会科学部創設 40 周年記念学生論文集》，199-208。
- _____ (2009)。〈思想の科学の転向研究〉，《社会学論集》，14：180-195。
- 鶴見俊輔 (1965)。《ジャーナリズムの思想》。筑摩書房。
- _____ (1967)。《限界芸術論》。勁草書房。
- 鶴見俊輔、粉川哲夫主編 (1988)。《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事典》。平凡社。
- 鶴見俊輔主編 (2005)。《源流から未来へ：『思想の科学』五十年》。思想の科学社。
- 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主編 (2007)。《無根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超えて：竹内好を再考する》。日本評論社。
- Weber, M., Gerth, H. H., & Mills, C.W. (Eds.). (194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格式

- 林鴻亦 (2022)。〈新聞事業與戦争責任：論日本「思想的科學研究會」之新聞思想〉，《傳播研究與實踐》，12 (2)：147-175。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6
- Lin, H. Y. (2022). Journalism and war responsibility: On the thoughts of Journalism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Shiso no Kagaku” in Jap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2), 147-175.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6 [Text in Chinese]

Journalism and War Responsibility: On the Thoughts of Journalism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Shiso no Kagaku” in Japan

LIN, Hung-Y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oh Lam Seng’s latest book titled “East Asian Journalism”,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war responsibility of journalism, which is the key premise of Toh’s journalism history research,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substantive domain that facilit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Japan. Before World War II, Japanese journalism focuse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cation with many elites devoting themselves to militarism propaganda. However, after World War II, these elites became key executives in assist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turning Japan into a democracy with mass communication. However, at that time, a “communication gap” emerged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s a result of ineffective delivery of meanings during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despite the use of language for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grasp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key role played by the magazine *Shiso no Kagaku* (1946) and later by the Society for the *Shiso no Kagaku* (1949). This also constitutes the context in which Toh’s writings can be understood. The conclusion revealed how journalism after World War II became a subject of Japan’s intellectual history, which allows for its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East Asian Journalism”, “Shiso no Kagaku”, Journalism, dis-communication, war responsibility

* E-mail: 075051@mail.fju.edu.tw

Received: 2021.12.16; Accepted: 2022.06.15